

论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逻辑结构

聂民玉¹ 段红智²

(1. 河北大学 哲学系 河北 保定 071002; 2. 保定学院 图书馆,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文、行、忠、信是他的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其逻辑进程是:“性相近,习相远”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中庸”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内圣外王”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理想目标。

关键词 孔子 德育 人性论 方法论 内圣外王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0)06-0030-05

一、文、行、忠、信: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内容

孔子的教学内容,都与道德教育有密切联系。这一切可以通过孔子教学生学习的主要科目和文献典籍中得到印证。

《论语》记载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73}其中“文”指文献典籍,“行”指行为规范,“忠”和“信”指道德修养。可见,其主要的教育内容是道德。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419}这里提到了孔子的四类教学内容,其中提到的“六艺”即:“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3]731}南宋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驭(御)、书、数之文。及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4]1}朱熹明确地将“礼、乐、射、御、书、数”归入小学的教学内容,即初级六艺。从小学进入大学,要学高级“六艺”又称“六经”。《庄子》中已有六经之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5]220}《庄子·天下》还概述了“六经”的内容:“《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5]487}孔子四教中的文,即其整理过的古代文献典籍——六经。孔子正是通过这些文献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的仁德的,或者说,六经是为孔子的道德教育服务的。孔子所关注的,正是六经的伦理道德价值。

六经中的《诗》即《诗经》,它不仅具有明显的文学

性,且亦具有非常强的性情陶冶作用。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诗教。他曾两次督促儿子伯鱼学诗:“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1]78}“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与!’”^{[1]85}他对儿子的这番教导,足以表明其对《诗》的重视。孔子还对学《诗》的意义作过如下论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5}“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的意义的全面概括。“兴”,古注解为“引譬连类”,即打比方,进行联想。朱熹注为“感发志意”,即获得启发和感染,借诗以言志抒情。这是讲诗的感染和陶冶作用。“观”,古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注为“考见得失”。这是讲诗的认识作用。“群”,古注解为“群居想切磋”。朱注为“和而不流”。就是说,诗可以教人互相砥砺,增强群体意识。这是讲诗具有合群作用、团结作用。“怨”,古注解为“怨刺上政”。朱注为“怨而不怒”,就是说,诗可以批评讽喻时政,或陈述怀抱、发泄苦闷怨恨等情绪。但这种讽喻或发泄要有一定限度,它不是攻击性的,而是建设性的,是为了促其改善、改良,而不是打倒。“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朱注说:“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就是说,举出事父、事君这两项最重要的人伦之道,借以说明,诗具有明人伦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这是讲诗的伦理道德作用和政治作用。

六经中的《书》、《礼》、《乐》、《易》、《春秋》更是如此。《书》是孔子开设的古代历史文献课。《书》又称《尚书》,是孔子将上古时代的历史典籍编辑整理而成的。孔子对《书》的内容非常熟悉,他在谈话时可以随口举《书》的文句来表达自己的伦理思想。一次,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政呢?”他回答道:“《书》上不是说嘛:‘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20-21}意思是说,把孝悌的道理施行于行政事,也就是从事政治

收稿日期 2010-07-27

作者简介 聂民玉(1969-)男,河北唐县人,保定学院政法管理系副教授,河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了,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从事政治呢?《礼》有三部:《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三礼”。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1178]。“礼”是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准则,其内容就是人伦道德。《乐》今亡。孔子既以乐教学生,肯定会讲有关乐的理论。乐是导和的,使人心情平和。“孔子晚而喜《易》,用功甚勤,‘读《易》,韦编三绝’^{[2]419}。和《春秋》一样,《易》也是孔门的一种高级课程,孔子通过阐述《易》的思想来进行道德教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1144]“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经》恒卦的爻辞。孔子的解释是,对于没有恒心的人来说,不用占卜就可知他们必遭羞辱的结局。显而易见,这里所倡导的无非是一种德性修养中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据说是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孔子在编写春秋时,遣词造句都灌注了自己的思想,寓褒贬于其中。正如孟子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6]155}

综上所述,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很丰富的,大致包括了今天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部分内容,而尤其突出了德育。

二、“性相近,习相远”: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孔子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基本命题:“性相近,习相远也”^[1181]。这一命题,回答了人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奠定了深厚的人性论基础。

“性相近,习相远”这一命题,内涵着三层意思。一是人们的“性”本来是相近的,这一观点肯定了人不论等级贵贱,生来的天赋素质本来是相差无几的。这种立足于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论,突破了西周以来以天生的血缘来决定人的高低贵贱的传统观念,也为他实施“有教无类”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孔子认为个性差别主要是由于人们的后天环境习染各不相同之故。由于习染的不同,才相距悬远了。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影响,力量更大,这就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三是德性的形成过程要以人人皆有相近的自然天性为基础,这就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

孔子第一次提出了性习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性”是“人性”的简称,是和“习”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性”在这里还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不像孟子大讲的“人性善”,而是指人的资质,即人天生的资质或先天的禀赋——先天素质。就资质而言,人们之间大体是相近的。人和人生来资质当然也有差异,或聪明一点,或愚笨一点,但基本相近。孔子的“性相近”说,虽未明指人有共同的善性,但从他对仁、孝等道德的普遍性的论述来看,他其实也认为人的本性在道德上相近。例如,他说人和犬马对父母能均有所“养”,在此点上不能说明人与动物的区别,区别在于人对父母不但能养而且有“敬”之德,犬马等动物

则无。这就把善德视为人与动物相异的本性。“习”字颇值讨论。所谓“习”指后天的习染,包括环境、教育、学习和经历等,即一个人具有怎样的道德品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以人人都能够受教育,都是可以在受教育中向上发展的,但由于“习”的不同,结果相距悬殊。如果每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就会充分重视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所以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167]品德不修养,学问不探讨,听到正义不追随,缺点错误不改正,这些都是孔子的忧虑。可见,孔子认为道德品质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才得以形成的,如果离开了后天的道德教育,人的道德品质就会被扼杀,人的善的本性就不能得到复归。可见,孔子强调道德教育是以其人性论思想为理论根据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性可以通过教化获得提升和改善,这一特点造就了中华民族一贯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于性习关系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却导致了以后儒家在性习之争上分化出“复性”说和“成性”说。孟子是“复性”说的滥觞,即以天性为德性,德性的形成就是天性的复归。他抓住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前半句,提出性善论。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就孟子看来,人但凭借其与生俱来之性善,就是自然地天生伟大,而要做一个完善的人,仅有同情心、正义感、礼让态度和道德判断能力这四个善端是不够的。人之贤愚,还取决于对这种先天的善端能否存而养之,扩而充之。如果自暴自弃,或者受到不良的社会环境、教育的影响,就会失掉这种善端,这就是他所说的“陷溺其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找回散失的善的本性,保存和发扬天赋的善端,因此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6]267}所谓“放心”指的就是人在后天所丧失了了的善端。孟子认为,任何人只要肯接受教育,肯于学习,就可以把先天的善端充分发挥,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圣人,他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6]276}其理由就在于人人都有善端,普通人与圣人在先天本质上并无区别。由此可见,孟子很看重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荀子则抓住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后半句,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并没有善,因而只有通过后天的习行,才能“积善成德”形成德性。所以荀子特别强调克己修身,后天教化,思虑清明,情发中节,志怀高尚,危微精一,强调礼法规范。当然荀子所谓的“性恶”,主要指的是“情”恶,而不是性恶,其言语行文中,只不过是“性”代“情”而已。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起伪”。人性本恶,任何人的道德观念,都不是本性固有的,而是“积伪”的结果,其过程就是由“性”向“伪”的转化。最终达到与恶的本性彻底决裂,永远不再走回头路。因此,经过“化性起伪”,最终也可以成为“圣人”,即“涂之人可以为禹”^{[7]500}。在这个意义上,荀子也强调了教

育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7]学习是人的素质和命运的决定因素,荀子否认了道德先验论,肯定了人是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产物,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荀子开创了儒家“成性”说的先河。

“人皆可以为尧舜”与“涂之人可以为禹”。这两句话的前提尽管不同,结论却是一致的,即人人可以成为圣人,人不论通过“复性”还是“成性”,都可以通过学习和教育,不断完善,最终达到善人、圣人的境界,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友善和睦的社会,国家就会和谐安定。

可见,孔子所开创的人性论即“性习”论,不但对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而且对整个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奠定了深厚的人性论基础。

三、“中庸”: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中庸”理论,是孔子教人成德达仁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或者说是一种处世哲学,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中庸”一词连用,在《论语》中仅见一处。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16]“庸”有三义,一是“平常”,一是“不易”,一是“用”。“中”指适中,中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标准。综上所述,可知“中庸”就是在日用常行中坚持适度适中的原则,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亦即理所当然处。中庸作为方法论,其基本意思是“无过不及”,也就是适度、适中,以求达到和谐,恰到好处。孔子对这一原则和方法的直接阐发虽然不多,但却贯穿在他的全部道德教育思想当中。

孔子把“中庸”概括为四个字即“过犹不及”,它的意思是,对一定的标准的执行来说,应该恰到好处——适度、适中,而不要偏入两端。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114]意思是说,过分与赶不上同样不好,谈不到哪个更好些。“过”是超过了正确,“不及”是达不到正确,因此都是要不得的。在文质关系上,孔子认为过分的质朴则粗俗(野),过分的文饰则妖冶(史),文与质要适中。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16]这是文质关系的中道。孔子评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130]这是哀乐情感表达的中道。孔子的弟子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17],这是性情、仪表上的中道。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18]是他的名言,其基本精神是二者紧密结合,交修并进。勤于思考,一般来说是优点,但也不可过分。《论语》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1150]孔子此语也许有具体的针对性,但作为方法论,强调了“思”也应适当,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1182]对于不仁的人,固然是应该憎恨的,但是也不能过分、过度,如果太甚,超过了应有的界限,也会出乱子。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

焉。”^[1188]确实如此。《论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187]意(主观臆测)、必(绝对武断)、固(固执拘泥)、我(自以为是),都是陷入绝对化,都是不合乎中庸的。又如思与行,孔子有时更突出“行”(践履)的重要,但基本精神也仍然是提倡二者的结合,不可偏废。孔子自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168]这就是说,学(行)与思二者,也应求适中。如果只注意一个方面,忽视或否定另一个方面,是错误的,有害的。“中庸”原则见诸政事便是“尊五美,屏四恶”。“五美”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11210]。所谓“四恶”指违背中道之四种政令,即不教而杀(虐)、不戒视成(暴)、慢令致期(贼)、出纳之吝(有司)。

孔子称“中庸”是道德之极致,一般人很少能够达到中庸至德,是因为不能将“仁”、“知”两者完满地结合起来,所以不是“过”就是“不及”。“中庸”之德一般人很难达到,“民鲜久矣”。按照孔子的设计,在中庸里,“仁”确保主体的行为坚定不移地朝着合乎道德的方向发展,即“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136];“知”则确保行为在为善的方向上适中无偏失,即“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163]。所以,仁、知的结合就使得中庸既是仁德而又高于一般的仁德,其行为是善的,同时又是恰到好处而无过不及的。因此“中庸”的理论内容,既包括“仁”又包括“知”两个方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1131]。孔子又说:“未知,焉得仁?”^[1149]“知”是一种理性的品格,按儒家的看法,缺乏理性的品格,主体往往会受制于自发的情感或盲目的意志,从而很难达到健全的境界。仁、知的统一表现了道德与知识相统一、伦理学和认识论相统一。孔子把作为人道核心的“仁”与理性的“知”融合为一,从而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但孔子坚持理性在先,从而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价值传统。孔子把“知”主要理解为“知人”。在《论语》中,孔子经常教育人要“知礼”、“知仁”、“知人”、“知政”、“知命”、“知言”、“知道”、“知义”、“知过”等,其目的是保证道德行为(仁)适中含度。依据这种界定,“知”的这种功能在于把握仁义等当然之则,并在行为中自觉加以贯彻。也就是说,理性的作用主要限于道德实践的领域,而理性本身也取得了某种伦理化的形式。事实上,在孔子那里,理性优先即是道德理性的优先。这种看法注意到德性对理性的制约,对于避免理性走向歧途,抑制人格的异化,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中庸”也贯穿在孔子的学习思想中。孔子讲好学,主要是学做人的规矩,因为不懂得善恶是非,就不能把握“中庸”之德。西方哲人苏格拉底说过“无知就是罪恶”,“无人有意作恶”。在苏格拉底看来,没有人喜欢或追求恶,作恶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善的无知。可见中西两位哲人,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认为,许多品德都和好学有内在联系,都应该与好学紧

密结合,不然就会转化为弊病。他说:“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8]。仁、知、信、直、勇、刚,分别地看,都是孔子提倡的优秀品质,可是,它们也都有各自的界限和规定,如果一味地“好”,不与“学”相联系,就会过了头,就会产生弊端,从而走向反面。

孔子倡导“中庸”的目的,就是突出一个“和”字,即“中和”,“和”的标准就是“礼”。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8]此句话虽出自有若之口,但也表达了孔子的思想。礼本来指的是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应的礼节仪式。但礼的根本目的又在于起中和作用,也就是要达到和谐的境界,才可称为“斯为美”。这样就造成了“礼”与“和”之间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按照儒家的礼治观点,就是要人们在遵守礼法的前提下和睦相处。所以,一方面是“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目的;另一方面,一味地为和而和,不以礼来进行约束,不讲原则,也是不行的。这就是“和”与“礼”的辩证法,也就是“分寸感”。这就是美,也就是“中庸”。孔子肯定了“和”的价值。“和”即“和谐”、“和调”。他认为礼的作用最重要的在于使不同等级的人之间既森严有别、又相互和谐(不争),即所谓“和而不同”^[114]。而“礼乐”的教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训练、培育和修养的结果。“和”是“仁、礼”合一的最高境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397}。“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就是“仁”,是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的“中节”,就是“仁”的表现要符合“礼”,“仁、礼”的统一就是“和”。只有“仁、礼”的统一,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总之,“中庸”作为方法论原则,这一至简又至深的现实主义智慧,贯穿于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四、内圣外王: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目标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1]一个从事政治的人,若以品德来号召,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北极星不动,其他的星辰就绕着北极星,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以“德”行政,将在人民心中产生一种向心力,无须强令而百姓自然而然地衷心拥护。孔子认为,儒家推行的德治与法家推行的法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优点。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2]就是说,用刻板的政令和繁苛的刑罚来治理国家,老百姓畏于刑罚而只求免罪,却没有羞耻心;如果用德教和礼乐去引导和熏陶百姓,他们就会自觉地走上

正道。这就是德治的优越性。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对统治者和自己的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而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内圣外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反复告诫统治者要首先端正自己,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当鲁国的上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孔子直率地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1129]只要执政者正己以正天下,老百姓(民)就会不令而行,否则,虽令不从。故其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129]贤德之人的德行,如雷之厉,风之行,对社会造成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136]在孔子看来,执政者如果端正了自己,搞政治就没有困难,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就不能端正别人,别人也不听你使唤。孔子特别强调执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教育执政者一定要“恭己”,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即“内圣”,由“内圣”而开启“外王”。孔子提出了治国的“南面之术”。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162]儒家讲无为而治,道家也讲,不同之处在于儒家有一个前提:“恭己”。“恭己”是指自己做得正直、谨慎,执政者要恭己,要为政以德,才能使老百姓的向善本性充分表现出来,实现天下大治。

孔子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努力成为士人、君子,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孔子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君子修养的最高目标。“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159]以“内圣”(“修己以敬”)为基础,以“外王”(“以安人”、“以安百姓”)为目标。孔子又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152]和“泛爱众而亲仁”^[114-5]作为个人的政治理想。一言以蔽之,由内而外,由己及人,修身正己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8]441}。《大学》中规定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的目的就是“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修己)修好以后,也就是说,“正己”以后,才能“正天下”,此即所谓“恃德者昌”。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程序,就是将道德价值扩充发展到政治价值的过程,充分强调了道德价值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

孔子对“以德治国”并没有提出任何系统的制度设计,他留给世人的只是一套关于政治实践的原则性宣言,因而他对德政的追求最后还是落实到“德”的承担者——圣人、君子身上,“内圣外王”成为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于是,社会改良的途径便只剩下了一条:君子以身作则的引导与教化——君子通过品行修养“下学上达”,以“道”的启示照亮世界,通过导民行孝化俗从政,以“德”的践行平定天下。这样,仁人志士的道德秉性实际上成了社会秩序的生发处。这也就(下转第81页)

参考文献:

- [1]左 荣.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下对平衡计分卡的改善[J].大众科学,2010(3):224.
- [2]莫生红.基于 AHP 的平衡计分卡评价指标权重计量[J].财会通讯,2008(11):51-52.
- [3]万良勇,李振中.基于 AHP 和 Fuzzy 的平衡记分卡应用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5):195-197.
- [4]刘 锦,李金林.层次模糊决策模型在平衡计分卡综合评价中的应用[J].工业技术经济,2007(3):45-46.
- [5]晏红果.平衡计分卡在企业绩效管理中的应用:基于系统学角度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1):79-81.
- [6]王 莹,张树平.基于 AHP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地下公共建筑消防安全评估[J].消防科学技术,2009(2):133-135.

Research on the Improved BSC Based on AHP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Under the Low-carbon Economy

Wang Xianjun¹, Dai Yonghui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3, China;
2. Shahe Power Supply Company of Hebei, Shahe 054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low-carbon economy, the environmental index is brought in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Balance Score Card, and each index is decided to be important or less important through the AHP method. The fuzzy assessment method is used to form the evaluation model for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hich is tested and studied. The improvement of this method not only meets the demands of the new economic environment, but also cuts down the subjectivity of index setting and illegibility as well as uncertainty of evaluation results. It's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 provided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f enterprise, also a metho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carbon economy.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 BSC; AHP; fuzzy assessment

(上接第 33 页) 是为什么孔子把如此多的心思放在了君子人格的修饰和打磨上的原因。

总之,孔子开创了历史上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先河,文、行、忠、信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其逻辑进程是:“性相近,习相远”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中庸”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内圣外王”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理想目标。层层推演,步步提升,孔子最终完成了自己道德教育思想的逻辑架构,形成了缜密的、有层次的、交相促进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 [3]郑 玄.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世界书局,1936.
- [5]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7]荀 况.荀子全译[M].蒋南华,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 [8]郑 玄.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On the Confucius Thought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Moral Education

Nie Minyu¹, Duan Hongzhi²

(1.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2. Library,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Confucius created a moral education, in which the main content is wen, row, loyalty, good faith. The logic process is: “By nature, near together; by practice far apart” is the basic of Human Nature, “the Middle Use” is the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being saintly inside and kingly outside” is the ideal goal of the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human nature; methodology; being saintly inside and kingly outside